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七五）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四一期 ——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6f）

| | |
|----------------------|-----|
| 【本刊专稿】关锋去世 | 余汝信 |
| 【人物春秋】关锋沉浮录 | 霞 飞 |
| 【往事回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秘闻 | 梁尚之 |
| 【历史一页】回忆中央文革记者站 | 李近川 |
| 【更正启事】 | 余汝信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关锋去世

• 余汝信 •

据悉，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于2005年6月7日晚21时40分在北京病逝，年八十六岁。

关锋自1967年8月被隔离审查，系狱十五载，早已远离中国政治风云的中心。笔者自1999年认识关锋，此后有多次晤谈。印象中，关是一位埋头钻进“国学”中却常带着微笑的老者，与文革时代叱咤风云、批判一切的“关锋同志”已相去甚远。窃以为，中央文革中的“小三”（王、关、戚）毕竟不同于“大三”（江、陈、康），也不同于张春桥，关当年以学术界中的“左派”参与文革，当是执行者，不是决策圈里的人，也算是被利用吧（而且还是用完即弃的那一类）。

首次与关锋见面后，笔者曾记有《关锋访谈录》一文，刊于香港的《广角镜》杂志。此文经关锋过目，得以认可。当时，关锋身体还很好，并称有信心活到百岁，未想近一年一病即沉痾不起！今征得《华夏文摘》增刊编者同意，特重发此旧文，以为纪念。文中提及的“戚文”，

即戚本禹。(2005年6月10日)

附： 关锋访谈录

数周前，得一位热心老前辈引荐，会晤了关锋先生。老前辈两口子与关锋、周英夫妇友谊非浅，多年未见，相谈甚欢。受一小屋子欢愉的氛围所感染，笔者与经年闭门谢客的关老先生虽初次谋面，然却了无局促拘谨之感觉，宾主之间的一问一答，仿佛也成为老朋友般一番闲聊了。

◇ 原名周玉峰今年八十岁

余：关于三十多年前中国所发生的事，人们已经写了很多。今天我首先感兴趣的，倒是你早年的经历。

关：近年，海内外有数本哲学史方面的人物辞典，收录有详略不一的有关本人的辞条，大致上都没有什么大错，有兴趣你可以去翻翻。现在，不少人都知道了，我原来姓的是周，名玉峰，山峰的“峰”，不是后来关锋的“锋”。一九一九年出生于山东西北部与河北交界的庆云县。但辞条中没有提及的是，童年时代，我在家乡读过两年私塾，所谓念过四书吧。北伐军兴，庆云才有了洋学堂，我才有机会考取了当时县里的“最高学府”——庆云中学。那阵子，庆云中学尚未设立高中部，所以，我的最高学历，不过是普通初中毕业。

余：当代中国知名的哲学史家，先生应可算一个吧。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再从师？

关：没有。青年时代，戎马倥偬（关锋一九三三年十四岁即参加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活动——笔者注），哪有再上学的机会！四九年后，稍得安顿，担任过报社的社长——《黎明报》，一个地区性的报纸。又当过学校的领导——师范、党校的校长。那时候，当社长的要自己动手写稿、改稿，当校长的要亲自备课、上课，形势迫着自己读书，那时，我就是自学，幸亏，还有些四书的底子。尔后，读书、写书、写书、读书……，我的历史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 五六十年代写先秦哲学史

余：说到写文章、写书，据说，“关锋”之外，你还用过几个笔名？

关：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笔者理解，关锋其实指的是文革以前。但今日的关锋，很注意尽量避免使用“文革”这个字眼），用过庆云、古棣、何明、东方明、撒仁兴等等。庆云，出自故乡县名。古棣，古之无棣之意。庆云这个地方，春秋时为齐无棣邑，《左传·僖公四年》载管仲语称齐“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我的家乡，即是齐国的北部边界。隋唐时置东西无棣县，至于庆云县，是迟至明朝初年才改西无棣县而设。何明、东方明，写杂文时偶尔一用。撒仁兴，取自“三人行”的谐音，那是与吴传启、林聿时一起写哲学史方面的论文时共用的。

余：用得最多的，恐怕还是“关锋”吧？那么，在“六十年代中期”及之前，用关锋之名发表过什么著作呢？

关：五、六十年代，以先秦哲学史为主线，我发表过三百多万字的著述。时过境迁，如今还值得一提的，大概有这么几本：《王充哲学思想研究》，一九五七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研究》，一九五七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研究》，一九五七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一九六一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六四年在日本发行过日文版；《求学集》，一九六二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春秋哲学史论集》，与林聿时合著，一九六三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 八二年重获自由再写作

余：近十多年来的著述情况，可否谈一谈？

关：我是一九八二年重获自由的。一九八三年休息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之后，重新开始了笔墨生涯。八十年代中期那几年，创作欲最为旺盛，我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是早晨六时起床，外出公园活动活动筋骨，吃过早饭后，上午写四个小时，下午写四个小时，晚上再写两个小时，高峰期每天一万八千字。前几年已发表的著述总计三百六十多万字，基本上都是脱稿于那一时期。

余：这一时期的著作，笔名全改用“古棣”？

关：是。一九九〇年，以古棣之名与夫人周英合作出了两部书，一部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和法学发生学》，三十万字；一部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惠施思想及先秦名学》，四十万字。与周英合作的一百四十万字的《老子通》上、下册，一九九一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年之后，以古棣为主编，戚文为副主编的一百三十五万字的《孙子兵法大辞典》，由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

余：戚文？是某位人士的笔名吗？

关：是。《孙子兵法大辞典》也是他去联系出版的。

余：你是否认为，后两部书是你近年最重要的著作？

关：可以这么说。《老子通》印了两千八百册，供不应求，如今本人亦仅存一册。《孙子兵法大辞典》印了五千册，书店或许还有小量存书。

余：近两三年还有动笔吗？

关：仍习惯一天五至六小时的写作、读书。现在我仍习惯早眠早起，精力自然大不如前了，全是白天进行，晚上就不干了。这样一天大约还可以写五、六千字左右。

余：是否尚有未及发表的文稿？

关：有相当数量。与周英合作有九十万字的《孙子会通》；与戚文合作有《论语十日谈》、《论语今译和解说》姐妹篇，共约七十五万字；与周英还合作有一百四十万字的《通假字典》，以上已定稿的，合计已是三百万字。至于未完稿方面，有《庆云斋丛稿》——关于校勘、训诂和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等方面的稿子，日集月累，现约有八十万字。拟数年之后告一段落，并在此基础上再写几本专著，书名拟为《校勘学新论》、《训诂学新论》、《汉语语法学新论》、《音韵学新论》，等等。

余：看来，这几年你对于校勘训诂之学颇有心得。这与我以往所想像中的关锋真可谓判若两人！

关：可能不少人都有类似误会。其实，早于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就写过几篇有关校勘、训诂方面的文章，有几篇收入了《求学集》。如《从讨论孔子哲学想出的一点意见》、《评〈韩子浅解〉》、《训诂札记》、《“郢书燕说”及其他》。从以上文章的观点来看，人们应该得到我当时已经比较重视校勘、训诂学的结论。在八十年代著的《老子通》里，我也曾经批评过某些出版物忽视校勘、训诂的不良学风。我说：不懂外文，不能望文生义，而古文是可以望文生义的。把“神器”解释为神妙之器，把“入军不能甲兵”解释为进入战阵刀枪不入，见到“均”字就是均分财产，就是平均主义，如此等等，那谈得上科学研究！今天，我仍坚持认为古籍的校勘、训诂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必须加强。我赞同胡适先生所说的，发现一个古字古意，如同发现一颗行星。对于古籍的校勘、训诂，前人没有涉及或没有解决的问题还相当多。乾嘉学派的成就和有效的方法，我们应该继承，但今人更应该有所发展，不能永远停留在乾嘉学派的水平上。

余：音韵学方面，先生有何见解？

关：王力先生（不是前中央文革的王力，是北大中文系的王力教授）在这方面是很有成绩的，但有些重要的问题看来离最终解决还有一段距离，我个人认为可以有新的方法去解决。我的一些新观点，将会反映在正在构思的《音韵学新论》一书中。王力先生研究音韵，从押韵上研究较为深入，而缺乏从古地名、古姓氏方面与现代读音不同的例子收集起来加以分析。如姜子牙的“牙”古念“吴”，现代牙含章先生的“牙”仍念“牙”。为什么？因为姜子牙是东夷族之后，牙含章是西夷族之后，两夷族的念法就不一样。山西“洪洞县里无好人”的洪洞，古时念“同”而不念“洞”，今也还是念“同”。为什么？值得探究。

六十万字《论哲学》正动笔

余：还有其他计划吗？

关：还有一些。正在动笔的有计划六十万字的《论哲学》，十余万字的《中国上古史大纲》，后者首章已在山东《哲学战线》上发表。约十五万字的《赫拉克利特新探》，我唯一一部关于外国哲学家的专著已完成过半，另《上古天文历法新探》正待杀青。六十年代出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将会有八十岁的新订稿。一九九一年版的《老子通》亦将会作出新的修订，版权问题一俟解决，将会再版。

余：文化大革命方面，有没有准备写点什么？

关：没有！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构想。今天没有，将来也绝不会有。我反倒是听到一些传闻，据称有不逞之徒要伪造我的回忆录，听说书名居然也有了，什么《文革回忆与反思》，准备寄到日本某出版社出版，实在荒唐！如果这个胡编乱造的所谓本人的回忆录能够出版，那将对我个人名誉造成极大的损害！如有机会，请代我向海内外各界作出澄清：我没有写过任何回忆录，如果一旦市面上出现类似出版物，那一定是托伪之作。

余：这些扫兴的事，不提也罢！今年，你已八十高寿了，今日所见，你身体硬朗，思维敏捷，有如六十开外。不是恭维，可否请教你的养身之道？

关：三句话，十二个字：用进废退，清心寡欲，经常运动。我相信，脑子越用越灵。平日，我轻易不食肉，粗茶淡饭，多食些鱼，对身体有好处。年青时爱打篮球，在学校当校长时是管球队的。八二年后，坚持早起散步，近年做气功，我做的是香功。

余：祝你长寿！

关：谢谢。不瞒你说，我个人有信心活到一百岁。

□ 原载香港《广角镜》杂志1999年8月16日第323期，略有删节

~~~~~

## 【人物春秋】

### 关锋沉浮录

· 霞 飞 ·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人叫关锋：一个是在西安事变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关锋，此人本名贾拓夫，做党的秘密工作时，化名关锋，是共产党的老资格的革命家，已于1967年去世。另一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关锋，此人在“文革”时期与王力、戚本禹被人并称为“王、关、戚”。本文记述的，是后一个关锋的沉浮人生。

◇ 得到康生赏识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庆云县。

关锋出生在贫苦人家。由于是独子，他父母尽管生活艰难，仍然克服困难送他去读书，并且一直供他读到了中学。中学时，关锋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接触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1933年，刚刚14岁的关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关锋，工作积极努力，对上级党组织的精神理解较快、较深，贯彻得力，又肯动脑子，有一定创造性。1938年，19岁的关锋就担任了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1939年，即20岁那一年改名为关锋。

关锋读过书，有文化，喜欢写作，组织能力也很强，又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了历练，成绩也很突出，因此受到党组织的重视。1944年，关锋被调往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任教育科长。1947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

关锋被调到中共山东分局工作后，正好康生也被调到山东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闲暇时间，康生除了读古书，鉴赏古玩，写毛笔字外，就是出门找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与他有同样读书爱好的干部聊一聊。

在寻找这样的谈话对象时，康生发现了时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的关锋。一来二去，康生开始对关锋由好感到赏识，觉得关锋是个有才干的干部。那时的康生，虽然因土改中的极“左”做法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但他毕竟还有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的职务，他向党组织提出的提拔干部的建议，还是很受重视的，而康生对于他所赏识的干部也是极力向组织上推荐、提拔的，加上那时关锋确实表现得很好，工作努力，有成绩，又有文化。因此，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关锋在党内的职务也就逐渐提升起来了。

1950年，关锋担任了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处长。1952年，关锋又调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

1955年，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

当时，中央高级党校在北京，就是在现在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负责培养党的省部级干部（也有一部分担任关键部门领导职务的司局级干部）。中央党校在各大区则设立中级党校，中级党校负责培养司局级的领导干部（也有一部分担任关键职务的正处级领导干部）。中央党校在山东省设立中级党校，是因为山东省委是在原来山东分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培养干部的任务很重。当时，校长是老革命家夏征农。关锋能担任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的副校长，地位和职务分量都是很重的。更重要的是，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给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中央党校山东第四中级党校，关锋不仅讲课，还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文章写得好，文笔较为活泼，不光是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

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康生分管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工作，也管文教方面的事，有了一定的权力。此时，关锋因小有名气，加上康生和中央的一些“秀才”的推荐，使他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来，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既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

是中央的笔杆子。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都是理论造诣较深，又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大人物，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

#### ◇ 在反右派运动中当上了“左派新秀”

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反击右派的政治运动。

反右运动开始时，正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关锋，自然对反右派运动的发动和发展情况十分了解，也更清楚毛泽东当时的思路变化历程。

在日常工作中，关锋很注意右派的言论和动向，搜集、整理出了右派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材料，及时上报给中央领导人参阅。但这仅仅是关锋当时工作的一部分。关锋工作中更重要的一部分，是在研究、分析右派言论的基础上撰写反击右派的文章。那个时候，关锋是很用功的，也很用心。他每天阅读大量的报纸、杂志，从中发现右派的言论，并对这些言论进行分析、整理，探寻其政治意向，然后有针对性地阅读马列的书、毛泽东的书，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材料，拟定写作的题目和提纲，再关起门来下工夫写作。写出文章后，关锋主要投给《中国青年报》，在那上面公开发表。那时，《中国青年报》既是关锋批驳右派言论的主要阵地，也是展现他理论水平和文采的主要平台。在关锋批驳右派的文章中，有一篇分量最重，就是1957年8月2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面的《驳所谓“一切领导阶级都有局限性”》一文。这篇文章，从历史的、理论的高度，分析了无产阶级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政党的必然性，是反击右派的文章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文章。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有几个人是经常发表“重头文章”的。在上海，姚文元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文章。他写的《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等文章，很有影响力。在北方，王力也以《中国青年报》为阵地，经常发表反击右派言论的文章。同时，关锋也在《中国青年报》上经常发表文章反击右派。这样，南有姚文元，北有王力、关锋。关锋与姚文元、王力一起，一时成了“左派新秀”。成为“左派新秀”的关锋，也被正式调入中央工作。

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关锋对他所干的这个工作是十分认真的。他编此刊时，搞的材料、写的文章，分析问题深入浅出，笔法也活，深受毛泽东的重视。主管《红旗》杂志的陈伯达，也对关锋十分赏识，有意提拔他。不久，关锋被任命为《红旗》杂志的编委。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中央一些高级别、理论水平较高的人才能担任此职，编委主任是邓小平兼任的，而陈伯达也是《红旗》杂志的编委负责人之一。

#### ◇ 急忙响应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关锋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他1958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在《红旗》杂志期间，不光是编《思想理论动态》，关锋还深入研究了中国哲学史。195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毛泽东在阅读《光明日报》时，看到了这篇文章，对关锋的观点十分满意，大加赞赏，还提笔在这篇文章的旁边写了一段批语。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在党内传达下去后，关锋的名字也被党的高层干部们记住了，党的思想理论界对关锋也更加注意了。

接着，关锋趁势而上，批起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杨献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在给党校学员讲课时，讲了“合二而一”也是辩证法的另一种表述的观点。对这一观点，毛泽东不赞成。关锋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后，开始撰写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在文章中，关锋认为，杨献珍的观点，是肯定对立统一规律，在政治上则是否定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关锋的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当时思想的，因此，毛泽东更增加了对关锋的好感。

在发表文章时，关锋经常用“庆云”、“何明”的笔名。他用何明的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杂文较多。由于这些杂文笔锋尖锐，引人注目。1962年，有好事者把关锋的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告关锋（以“何明”的笔名）发表的杂文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看了告状者送来的署名“何明”的杂文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毛泽东的这句话，使关锋身价倍增，从此，包括那些中央重要干部在内，都对关锋刮目相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支持下，由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长时间酝酿、修改而成的。这篇文章不是学术性的，而是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提到了当时中央高层的政见分歧，已经包含了要在当时的中央内部揪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内涵。

姚文元在文章中实际上点明了两点：第一点，当前党内正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第二点，中央里面有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要掌权、执政。这两点无疑给了人们一个明确的信号：要搞大的政治运动打倒中央的修正主义者。“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围绕着对待这篇文章中所点明的观点的不同看法而爆发的，因此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但是，姚文元的文章虽然包含了现实政治的针对性，却又是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名义出现的，因此，当时读过这篇文章的人，有的看出了文章中包含的很强的现实政治性，有的则没有看出来，只把这篇文章当做学术文章来看待。

一向对政治十分敏感的关锋，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初，竟然没有看出文章中所包含的深刻的现实政治性。那时，他是把这篇文章当做学术文章来读的。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文汇报》驻北京的记者为了寻求北京的“左派理论家”的支持，特意找到了关锋，请他谈谈“读后感”。关锋就学术方面的认识谈了一番话，《文汇报》的记者大失所望。关锋为什么没有认识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的现实政治性？这恐怕与关锋在中央工作、一向通过了解“重头文章”产生的内部情况来推断文章的“政治来头”有关。他形成了这样的思维习惯后，一时难以改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毕竟是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搞出来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不久，围绕此文的争论在中央上层和学术界同时展开，关于此文产生的内幕也逐渐清晰，关锋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了这篇文章的“来头”之后，他立即紧紧跟上，不仅在讨论中公开表态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而且对姚文元的观点加以强调和发挥。在整理的有关材料中，对姚文元的文章大加赞扬。关锋的态度和整理的材料，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个中央的理论家、大笔杆子谈话，在参加这次谈话的人员名单中，关锋的名字也列入了其中，与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并列在了一起。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明确肯定了姚文元的文章，也肯定了戚本禹响应姚文元文章而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这次谈话，艾思奇、关锋负责记录。关锋首次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大笔杆子的谈话，自然受宠若惊，记录很努力，几乎一字不落地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记了下来。在参加这次谈话和记录毛泽东讲话内容的过程中，关锋对毛泽东的观点了解得更清楚了。此后，关锋所写的一篇篇响应姚文元的文章、内部材料便陆续产生了。这更使毛泽东重视关锋

了。不久，关锋便被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笔者注）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

#### ◇ 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五一六通知》中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可见，当时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的机构，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同时，它又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关，权力是很大的。那个时候，中央下发文件，常常是这样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是：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关锋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首先是毛泽东对他的关注。过去，毛泽东就很赏识关锋写的文章，在发动“文化大革命”阶段，关锋又成了积极拥护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左派”。因此，他受到毛泽东的关注是必然的。

关锋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跟得紧。1966年5月8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指责《北京日报》4月16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关锋发表这篇文章，正好是毛泽东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批判北京市委的时候，关锋的文章，对毛泽东起到了配合作用。

关锋能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的赏识。关锋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社工作期间，由于工作关系，同陈伯达接触较多。关锋对陈伯达表示了足够的尊敬，而陈伯达对关锋的理论素养和写作能力也十分欣赏。康生在历史上就与关锋有上下级的关系，更是替关锋说好话，多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到并推荐关锋。而江青在筹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之后，看到关锋积极配合与支持这篇文章的发表，因而对关锋很有好感。有这些人的抬举，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后，一方面出去搞“调研”，与红卫兵接触，发表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讲话、谈话，鼓动红卫兵造反；另一方面，也写一些文章和内部调研报告。由于关锋实在“太忙”了，抽不出时间来写文章了，更谈不上仔细修改文章了，因此，他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和调研报告中，真正有分量的不多。

但是，关锋以其多年政治经验和在中央工作养成的习惯，对政治形势十分敏感，经常深入分析。这种习惯，使他在关键时候走了关键的一步棋——给江青写了一封关键的信。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中央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犯了严重错误，甚至说他是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但毛泽东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把他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没有把同刘少奇的矛盾看成是路线斗争。而关锋却对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分歧下了一番工夫进行分析，对这一矛盾性质进行了概括，认定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路线斗争。认定这一点后，他经过一番思索、酝酿，于1966年7月24日提笔给



江青写了一封信。关锋在信中说：“我认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出现了一个逆流”。信中还说：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

江青接到关锋的这封信后，十分重视，马上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十分赞成关锋的观点，并把关锋这封信转给了林彪看。林彪看后，也十分赞赏关锋的“眼力”。毛泽东决定，把关锋的这封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会文件印发。这封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这封信的启示，这次会议把刘少奇、邓小平作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同时，这封信也是促使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因素之一。此后，毛泽东把与刘少奇的斗争，看成了路线斗争。

关锋的这封信，不光对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他本人的一生来说，也有重要影响。自从关锋写了那封信后，毛泽东对他更加重视了。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举行家宴所请的人中，关锋名列其中。关锋的信被毛泽东重视并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下发后，作为中央二号人物的林彪也开始重视关锋了。林彪派叶群去找关锋，问了关锋家里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从此，关锋与林彪也有了“直线联系”。林彪还点名让关锋管《解放军报》，还提名让关锋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那时，政治上比较机灵的关锋，已经看出了林彪与江青之间有裂痕，因此，他想两边讨好。每当林彪要见他时，他总是拉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一两个人同去，他怕单独去会使江青产生猜疑。这一手果然很灵，那时，林彪和江青虽然勾心斗角，但对关锋都十分信任。

#### ◇ “文化大革命”中的活跃分子

毛泽东的信任、林彪的信任、江青的信任，使关锋觉得自己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放手大干一场、“立新功”了，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关锋是一个十分积极、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经常到红卫兵组织中去，到各造反派组织中去，发表谈话，鼓动红卫兵组织和各造反派组织造反。对于中央的一些干部，关锋的指责往往就是他们被打倒的信号。他和王力、戚本禹一起，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骨干分子。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成了制造动乱的指挥者。他们三人并称为“王、关、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时，人们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陈伯达、康生、江青并称为“大三”，把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活跃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并称为“小三”。

在揪斗彭德怀问题上，关锋起了作用。早在1966年4月12日，关锋就和戚本禹一起，在给中央写的一个材料中提到：对于让彭德怀去三线当副总指挥，我们“思想上有保留”，“反对这样处理”。6月16日，关锋和戚本禹又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关锋和戚本禹的这封信，很快就在红卫兵组织中传开了。“中央首长”的这封信，成了红卫兵把彭德怀从三线揪回北京进行批斗、乃至武斗的口实。彭德怀从三线被揪回来后，身心受到巨大伤害，最后不幸患病，含冤去世。

在“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是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冲击住在中南海里的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些老干部的鼓动者之一，而对于这些冲击行为，关锋则是积极支持者。

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之一，还有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并主持起草含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红旗》八一社论。这件事，也使他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管《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就在全中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的提出，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各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泽东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提出，也是引发武汉“七二〇”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进行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对一些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了。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在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此时，康生于1967年7月25日在审定新华社电讯稿时再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同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发表的声讨陈再道等人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对于这些，关锋是赞同和支持的。7月底，关锋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在起草过程中，关锋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这篇社论提出：“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篇社论经陈伯达签发，在《红旗》杂志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先是引起了林彪的不满。但林彪在当时的表态是很含蓄的，他没有直接提这篇社论，而是在8月9日接见曾思玉、刘丰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林彪在这次讲话中，不仅没有提“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反而说了上面这样一段话，很明显，林彪对这篇社论是持不同看法的。

接着，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的做法不能容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也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那就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8月11日至12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及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20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组织下，《红旗》杂志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可靠支柱》的社论，重提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中央文革小组实施这些转变时，他是参与者。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已经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 ◇ 周恩来让关锋“请假检讨”

毛泽东对“王、关、戚”产生不满后，本想再观察观察，考虑考虑。但是，王力在8月7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人时，发表了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即著名的“王八七讲话”）。在他这个讲话的鼓动下，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部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周恩来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来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还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后，于8月26日上午做出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请周恩来把王力、关锋抓起来，而对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关锋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他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报纸，还被允许听收音机，但不能自由活动。这样，他实际上仍然能够知道外界的政治动向。在2号楼，他在规定的范围内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1967年10月，中央派陈伯达找关锋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关锋和王力都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关锋的生活待遇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此时关锋的生活还算是平静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条件就差多了。不光是住得差，吃得也很差。这让关锋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感觉：自己的问题升格了。不久，他的党籍被开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关锋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他被放了出来。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于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

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和发表文章、署名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那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晚年的关锋，生活和心理都平静了下来。他说过，自己晚年只有三大爱好：看古书、看电视、练气功，其他什么事情都不想了。穿着还是老一套：戴个干部帽，穿着中山装，不抽烟，不喝酒，每天三顿平常的饭菜，接着就是埋头于研究老子、庄子、孔子。他的兴趣很广泛，甲骨文、哲学史、电脑，都懂一些。每天一大早，关锋的身影就会出现在他家附近的公园里，混在一帮练功的人群中，和大家一起一招一式地认真地练着。

□ 《党史博览》2005. 5

~~~~~

【往事回首】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秘闻

· 梁尚之 ·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于一九七七年正式出版发行。

鲜为人知的是，一九六七年，中央即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担负其任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理论组。

历史上这一页是在我国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写成的。

梁尚之亲历了这一段历史，告诉你——

1967年至1970年，3年多时间里，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在中南海甲楼参加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些具体事务性的工作。尽管历史上这一页是在我国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写成的，毕竟是我亲历的一段历史，在此作些回顾，期望能补缀正史之不足。

◇ 出乎意料喜忧参半

196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中办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找我谈话，和我同去的还有警卫二处的江涛同志。杨德中对我俩说：“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担负这项重要任务的是中央文革理论组，他们在中南海甲楼办公。中办要求我们选调几个有一定理论水平、有较高文字能力的同志参加这项工作。局里研究决定，抽调你们两个人参加。”

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这对我来说确实出乎意料。听到这个消息，特别是领受这项任务之后，我的心里很矛盾，可以说是一喜一惧。喜的是领导信任，这么重要的政治任务，让一个20多岁的青年参与其间，说明他的才学得到了认可，而且在参与这项工作中，他肯定又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惧的是那个机构，那可是“中央文革”的下设机构，全国政治动乱的策源地和核心！中央文革小组自从成立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搅乱了全国，搅乱了北京，搅乱了中南海。当时，正值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一周年之际，他们怂恿北京甚至全国的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指使中南海内的一些人批斗、围攻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受到株连，有的被下放基层，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监禁入狱，有的甚至非正常死亡。机关内部，有的领导同志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斗，普通工作人员中也不时被“揪出”一些“反革命”和“阶级异己分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身处政治漩涡的中心，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被扣上一顶“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帽子，导致身败名裂、万劫不复。这对我来说，真有如临深渊之感。在当时情况下，拒绝是不可能的，服从分配是天经地义的。

后来也想开了：现在，全国各地，哪里不处在混乱之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967年7月28日，我就是揣着这样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踏进中南海甲楼的。

◇ 非常岁月奇谈频出

甲楼是建国初期中南海内建造的一组楼房中的一栋。上个世纪50年代，刘少奇同志曾经在这里居住，后来迁到福禄居。60年代居仁堂拆除以后，中央有关人员曾搬到这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央一些机关处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小组设置了一些下属机构：办事组等设在钓鱼台等地，理论组设在中南海甲楼，占据了一层所有的房间。

甲楼与朱德委员长居住的乙楼是姊妹楼，它们之间还有丙楼、丁楼。乙楼及周围墙上张贴的诬蔑朱老总的大标语，虽然已被撕毁，但笔墨狼藉，字迹可辨。德高望重的朱委员长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晨练、散步。有一次，我晚饭后经过回廊，正巧遇到一伙人批斗新上任的中央常委陶铸。他们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稍有闪失就讽刺、挖苦、训斥他：“你这个中宣部长是怎么当的！”当时，在丙楼办公的中央专案组有不少军人，在丁楼办公的信访局借调了一些部队的同志，会议室服务处的同志也穿上了军装，乙楼原来就有警卫哨兵，加上甲楼我们这些人，白天晚上在各楼里出出进进，整个西楼大院好像一座兵营。

当时的理论组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当时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部分是来自部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有干部也有战士。负责人是学部的杨永志和中办秘书局档案处的钟仲。他们此前的两大任务是搜集出版刘少奇的著作和言论，供批判使用，还有就是编辑发放范围很小的内部刊物《大批判》。我们到来不久，他们编印的灰色封面多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出版，存放在甲楼东北角的一间房子里。

大概是基于“工农兵占领理论上层建筑领域”的指导思想，要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所以部队的同志大多来自基层，他们待人诚恳，作风朴实，但文化程度较低，文字能力不高，在工作中困难不少，有时还会闹出笑话。我听说，在整理刘少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时，需要增添一些标点符号，以便文通字顺，较好地表达原意。但是，一名参加这项工作的战士想不通。他认为，毛主席的讲话有标点符号，如果刘少奇的讲话也加上标点符号，让他和毛主席享受同样待遇了，这不就抬高他了吗？

我们来到甲楼的第10天，8月7日，王力发表了后来被人称为“王八七”的讲话，王力、关锋倒台。几天后，学部的同志撤出，回单位参加“运动”。不久以后，戚本禹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中央文革的下设机构撤消。到1967年的秋后，甲楼里只剩下钟仲、江涛、我，以及部队的3位同志。

◇ 精读毛选顺阅名著

政治形势暂趋平稳，工作人员相对固定以后，根据领导的指示，我和部队的一位同志到永福堂接管了田家英同志那里的材料。在进入冬季的一个寒冷日子里，我们从中央档案馆接管了毛主席1949年10月1日以后至1962年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在中央警卫团的押送下运入中南海，放置在甲楼南面中间的屋子里。编辑《毛选》五卷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甲楼的组织改称“材料组”。我的主要任务是：保管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看管有关的图书资料；联系秘书局印厂和收发室，印制文稿，收发信件。

不久，中央开始着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选编工作，地点在怀仁堂，参加者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加上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这件工作刚开始时，康生在怀仁堂东休息室接见过工作人员。每天晚上，这些人在怀仁堂阅读我们提供的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然后决定哪些文章入选，哪些文章不入选。每次会议的情况，都反映在一个名为《天天读》的简报上。但是，没有多长时间，选编工作就停止了。

1968年春天，中南海各单位响应毛主席“种花没有用，种菜可以吃”的“庭院革命化”号召，挖掉花草，在花圃和草坪上大种蔬菜瓜豆。我们这些无事可干的人有事干了。来自基层部队的同志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不怕苦、不怕累，脏活儿重活儿抢着干，赢得了周围的人的赞许。我们种的蔬菜获得了大丰收。

工作停顿了，何时恢复没有期限。后来，基层部队的同志回原单位了；江涛回警卫二处上班了；很多时候，钟仲因为秘书局有事也不到材料组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甲楼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工作，也只剩下保管文书档案这一项。

远离政治运动的干扰，没有其他事务的纠缠，身边又有那么珍贵、丰富的档案、资料和图书，这对于我这个书呆子来说，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机。当时甲楼存放档案的地方，不是库房，是普通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这里没有防虫、防潮、保持恒温的设施，也没有空调、电扇，只有一支温度计和一支湿度计，没有防护工具，文件装在书套里，书套放在铁柜里，铁柜放在地板上。为了防潮，需要多开门窗，但要防止虫子进入；为了防霉，需要多开书套，翻晾文件，但要严防磨损。这样一种近于原始的工作方法，使我有机会反复接触毛主席这一时期的文稿原件。我还浏览了一遍《刘少奇言论集》，翻阅了我所保管的大部分图书杂志，不少是过去没有读过的，如，康生批注的《金瓶梅词话》、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和她的情人》等。在普通书籍里，我发现了毛主席亲笔修改的《评“白皮书”》等小册子。

◇ 临近出版主席否定

1968年冬天，“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受到迫害，我在农村的亲属也无端遭到诬陷。我当即向上级写信，如实报告了情况，请领导考虑“我继续留在甲楼工作是否合适，我不愿因为我的家庭问题给党的事业造成任何损失”。同时，为了防止意外，我在甲楼后面的菜地里挖了一个大坑，用了三四个晚上，把自己写了十几年的日记、搜集的资料、草拟的文章，除已经发表的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各留一份作纪念以外，分批统统烧掉。报告送上以后，单位派人进行了调查，汪东兴、张耀祠同志作了批示，杨德中同志找我谈话，让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安心工作。

1969年五六月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带着6个人入住丙楼二层东侧的几个房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又一次启动。这6个人来自两个单位：3个是中央党校的，3个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后来有一人退出）。据说，这次的计划是“十一”前夕要公开出版发行，为国庆20周年献礼。那时的工作程序大体是这样的：我将手稿（如果来得及，即誊写为抄件）或原始记录稿送印厂排印成草稿，送丙楼；丙楼工作人员，先按照个人分工予以修改，再集体讨论通过；修改时一律使用铅笔，这样的修改稿可以看出草稿的原貌；然后将修改稿分抄一式数份，分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有关政治局委员；这些领导修改后退还丙楼；丙楼再综合他们的意见，形成一个初稿，再送印厂排印。我一个人，既要保管档案，又要联系印厂送取文稿，还要在丙楼和收发室之间传递信件，虽然有时钟仲也来帮忙，但我仍然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我的妻子怀孕，因为我日夜无眠，她只好在外地生产。我第一次见到儿子时他已经半岁了。这样忙到9月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送审本出来了，钟仲和我还到人民出版社联系出版发行事宜。但是，事到临头，突然接到指示：不出了。据说，毛主席不同意。

◇ 四件事情感触最深

在这次参与“毛选”五卷的选编工作中，我感触最深的有4件事：

一、周总理怒斥“反历史主义”。毛主席在一次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讲话中，批评了一些人，其中曾经几次提到刘少奇同志。在原始记录稿中，凡是提到刘少奇名字的地方，后面都有“同志”二字。丙楼发出的修改稿，把“同志”二字统统删掉了。周总理把修改稿退回来，在第一次出现刘少奇名字的地方，眉批“这是反历史主义的”，并把所有刘少奇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画上恢复号。眉批和恢复号也都使用铅笔，黑黑的笔迹深深地嵌在纸里，还有折断笔芯的痕迹，由此可见周总理对当时“反历史主义”现象的厌恶。正当李鑫他们接到总理的修改稿表情沮丧、不知所措的时候，总理又把稿子要了回去。当再一次拿到总理的修改稿时，“这是反历史主义的”眉批用橡皮擦掉了，刘少奇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只有在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保留下来，其余的也都不要了。总理的两次改稿，给我很大的教育和启迪：在当时政治形势异常险恶的情况下，既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尽量保护同志，又要使别有用心的人找不到伤害自己的借口，体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机智的灵活性。

二、陈伯达想把关于农业互助合作问题的有关决议编入选集。这个决议是陈伯达起草的，原稿是他亲自用钢笔以工整的行楷抄写的，看来确实下过一番功夫。这次选编工作开始以后，陈把这个决议的所有材料，从草稿到定稿，都调出来反复研读，并供有关人员阅酌，但最后还是没有入选。落选原因，我想，一是因为此文虽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起草的中央决议，毛主席也进行过修改，但毕竟不是毛主席的原著；二是选集中此类文章不少，内容重复，作为附录，文字也嫌太长，喧宾夺主。

三、找不到有关林彪的文章。入选《毛选》五卷的文章初定以后，根据康生等人的意见，李鑫他们感到最大不满的是没有关于林彪的内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没有出现呢？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于是他们让我在我保管的所有档案中查找有关材料。但是查来查去，只查到了一封，是衡宝（湘南）战役之后，林彪伤病复发，毛主席让他休息养病的电报。电报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大意是：惊悉你身体有病，甚为惦念，望好生养护。如此而已。这份电报，确实表达了毛主席对林彪的关怀，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样的电报选入选集，一是三言五句不成文章；二是产生的效果可能有违选编者的初衷。所以只好作罢。

四、选集中对历史事件的臧否和人物的褒贬，决定于选编者的取舍之间。毛主席的讲话有的篇幅较长，有时为了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他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阐述。但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定的政治目的，选编人员往往根据某个领导的意见，有倾向性地予以取舍，这必然会歪曲事实，片面地误导读者。

当时初定的《毛选》五卷送审本的文章中，有两个现象：一是毛主席的一篇文章，在五卷中分列出几个题目，以几篇文章的面目出现；二是毛主席的几封书信或电报，以辑录“语录”的形式出现在一篇文章里。究其根本，上述理由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另外，毛主席的一些信件，有时不是写给一个人的；对某件事情的批评或表扬，有时也提到好多参与者。在选集中，这些人的名字留谁不留谁，完全由康生等人的主观需要而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笔下去，入了毛选的人，受褒者可以上天堂，受贬者一定下地狱。

1970年夏天，李鑫带着丙楼的工作人员开始了宪法的修改工作。中央开会之前，他们带着“设国家主席”和“不设国家主席”两套方案上了庐山。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会议不欢

而散以后，他们悄悄地回到丙楼，有的激愤不平，有的灰头土脸。据说钟仲挨了康生严厉的批评。没几天，“学部”的同志就离开了。

工作又一次停顿下来。这年秋后，我向钟仲交代了工作，回到离别已经近4年的原单位。

□ 《读书文摘》2005.2

~~~~~

【历史一页】

回忆中央文革记者站

• 李近川 •

中央文革记者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存在过的小机构，归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领导，1966年9月成立，1969年5月撤销。它派出的记者，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两报一刊记者的名义，奔走于全国的大中城市；所调查采写的稿件，常常被送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案头。三十多年过去了，记者站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由什么样的人组成，都做了什么事，为谁而工作等等具体情况，至今仍鲜为人知。80年代全党整党时，对在这里工作的人，曾分别作了审查，但现在了解记者站全貌的人，依然不多。

我参加了记者站工作的全过程，知道它的始末情况。退休后空闲下来时，常常回忆起那段历史，总觉得应该把回忆起的，或有资料可查的有关记者站的事情，如实地写一写，公布出去，让更多的人看看，对那些关心、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或许有用。

◇ 海运仓集训

1966年夏天，我从农村“四清”点上回来，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匆匆走访了两个军所属的几个部队，急于熟悉一下离开八个月后的部队情况，准备做点报道。这时，接到新华社军事部的紧急通知，让我立即去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报到，参加集训。我是接通知第二天赶到的，这是8月下旬的某一天。

到海运仓招待所集训的，都是新华社驻各军种、军区的军事记者。来自驻空军、海军及北京、南京、广州、福州、济南、成都、兰州、内蒙古等大军区的分支机构（分社、支社、记者组、常驻记者），共二十多人。听新华社军事部的同志说，我们是被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新华社选调来的，选调的条件很严格，必须是出身历史、社会关系、工作和思想表现等方面没问题的才行。记得集训中途还被退回几个。

集训由总政治部和新华社组织，主要是学习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有“五一六通知”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材料等。边看文件边讨论，提高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总政治部副主任谢镗忠和新华社社长王敏昭讲了话，介绍“文化大革命”开展情况，传达中央关于选派记者的决定。向我们交代任务，提出要求。谢镗忠说，在前不久的一次中央常委会上，鉴于全国开展运动，许多地方很乱，有些地方党政机关已不能正常掌握并向中央反映情况，毛泽东主席提出，选派一批记者，以解放军报记者的名义，去全国各地调查了解“文化大革命”开展情况，向中央报告，使中央能及时观察和掌握全国运动。这就是交给我们参加集训的记者的新任务。两位负责人还反复要求记者要认真学习，站稳政治立场，广泛接触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如实采写稿件反映情况，遵守纪律、严格保密，要把这个工作当作政治任务去圆满完成。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从没见过的塑料皮的四卷合订本《毛泽东选集》，让我们随身携带，经常阅读，



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调研工作。

那个时候，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开过，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已经公布，不少地方开始大乱。我们这些来自军队的记者，对地方运动形势很不了解。对运动的性质、目的、做法的理解，也只限于中央文件和报纸上讲的那些，脑子里装了不少问号。

我感觉，给我们讲话的两位负责人，对当时的运动也不甚理解，讲话并不透彻。王敏昭还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向我们谈了一件事，并说了他的看法。他说，北京一些红卫兵已“勒令”新华社回答问题。他们指责新华社发的一幅毛泽东主席的坐像照片上，有一把刀的影子，说这是“谋害毛主席”，“是政治问题”，准备当天冲击新华社办公地点。王敏昭说，这幅照片上根本看不出有刀的影子。毛主席身边即使有一把刀，可以裁裁纸，削削水果，难道领袖身边就不能放把刀吗？王敏昭告诉我们，给我们讲完话，他就要赶回去研究安排如何应对红卫兵即将到来的“问罪”行动。我听了这些话，心情很沉重，感到这次调研任务实在艰巨，不好完成。别的记者也有忧心忡忡样子的。

这次集训，弄得心情很惶恐。对怎样工作没有底数。

接下来，我们按要求开会，选举记者临时党的支部。结果，广州、南京、济南军区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当选。

#### ◇ 记者站的初建

9月初海运仓集训结束，我们由国家机关管理局工作人员带领，转住到北京钓鱼台宾馆对面花园村一号院的几座住宅小楼里。听说这里原是国务院几位部长的住宅，这时没有人住。其中有的房子很新，好像从没人住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到那里给我们讲话，重申了为中央反映情况的任务，宣布成立中央文革记者站，由记者站具体组织记者进行调查研究反映情况的工作。还宣布了记者纪律，即：只调查反映情况，不介入派驻地“文化大革命”运动，遇事不要表态、干预，不要泄密等等。他还介绍了全国运动形势，说运动在许多地方已经发动起来，一些地方造反派受压，斗争复杂激烈，总趋势是在发展前进。中央的方针是让它先乱一段时间，乱而后治。

王力给记者站确定的领导体制是：记者站对外称解放军报记者站，受中央文革办事组领导；派驻各地的调查采访活动，不受当地党政军机关领导，只对中央负责；采写的稿件不受任何人审查，只传给记者站，打印报中央政治局常委。

当时明确了工作方式：去外地的记者组，持解放军报的介绍信和记者证，住各地军事机关，由军事机关提供交通、通讯、办公地点等工作条件。在当地党政军民学等各界中，独立调查研究，自主采写稿件。稿件一般要用保密电话，少量适合的用机要传递或邮寄，传给设在北京的记者站，由记者站编辑人员编审打印，再由机要通讯人员直送中央领导办公地点。

当时还确定，记者站就设在花园村一号院，邮政代号是北京811信箱。站的内设机构，开始只设负责编审稿件的编辑组、接收稿件的通联组、打印稿件的印刷厂。印刷厂工作人员是由外单位临时选调来的。国家机关管理局派来了财会人员和交通、服务人员，负责后勤保障。

刚当选的党支部成员，成了记者站的行政业务领导成员。根据分工，他们有的留京主持全面工作，有的带记者组去外地。

9月初，匆匆完成记者站的初建工作后，就派出记者组，分赴当时最乱的兰州、西安、天津、青岛等地，每组三至四人。北京地区的调研工作，由解放军报社负责，不归记者站管。

#### ◇ 记者站的扩充

到1966年底，记者站陆续扩充起来。那时，全国大乱的地方越来越多，调查的任务也相应加重了。原来由解放军报社负责的北京地区的调研工作，也转由记者站担任。记者站的规模已与繁重的任务不相适应。经周总理同意，陆续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放军政治学院、空军、海军及沈阳、济南、北京、广州等大军区，选调几批干部来站工作。最多时，采编人员和行政人员（不含印刷厂、通讯和后勤人员）达200多人。另外，后期还吸收了少量在校大学生。

1967年，我在记者站抄录了全站人员名单，上面详细记载了记者的姓名、来源、原工作职务、行政级别、年龄、文化、家庭出身等内容，这就是扩充后的全部人马。现在翻看这30年前的名单，仍能一一回忆起每个人的音容笑貌。根据其来源及原工作性质，这些人大体为四种类型。

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编辑共40人。其中军事记者27人，是来自战争年代的战地记者和建国后培养的军事新闻工作干部；新华社总社的记者、编辑7人；人民日报社的记者、编辑6人。他们都是我党培养的老新闻工作者和建国后从大学生中吸收的新闻工作新人。这些记者、编辑是记者站的骨干。记者站的主要领导、编辑组的全体编辑、北京组的大部分记者等岗位，由这些人充任。

马列主义研究院来的14人，都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大都在30岁左右。解放军政治学院来的26人，其中多数是教员，少数是机关干部。这些两院干部大部分是理论工作者。

来自空军、海军、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广州军区的军队干部129人，其中多数来自各级机关，少数是团以下干部。

中央办公厅来的是一名年轻干部。

上述人员都是选调来的，大多数工作热情高，能深入群众。执行任务时，夜以继日，不休节假日，冒危险出入武斗现场，有些甚至遭围攻、被殴打、被关押，仍能坚持完成工作。少部分人，开始时调查采写的业务不熟，能虚心学习，边做边学，后来也基本胜任了工作。

记者站扩充规模后，领导班子成员也相应做了增补。增补了中央办公厅的一人，沈阳部队来的一人，中间一段时间还增补过济南和沈阳部队来的各一人。在北京的机构，也陆续健全，增设了秘书组、联络组和北京组。秘书组负责全站行政事务；联络组负责联络在北京大学生中特邀的联络员；北京组负责北京地区的调研工作，类似外驻记者组，但人员多数住站里，少数在点上。还设专人负责编印全国重点大字报，这也是独立的一摊。编辑组、通联组和印刷厂均增加了力量。

#### ◇ 受到王力的批评

记者站初建后，我被分到外派的西安组。9月上旬，我们组共计4人，飞抵西安。先住兰州军区空军，几天后又住到陕西省军区。由于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马宁和省军区副政委肖潮的

亲自妥善安排，提供了电话、汽车、办公用房等方便条件，使我们马上就投入了工作。

我们先后采访了西北局和省市委领导刘澜涛、霍士廉、王昭、李登瀛、韩劲草、薛焰，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瑞光，省军区的肖潮等领导，听取了情况介绍和意见；在一些学校、工厂、西北局和省机关听取了各派头头的情况介绍；在省计划、商业和农业部门了解了工农商业生产经营情况；去郊区工厂、市内商店、火车站调查了生产经营实况；还在长安县农村和西安交通大学蹲了些日子，对运动和生产做了典型调查。报道了西安主要群众组织的成因、力量分布、主要头头、主要观点、主要举动等情况；各派的对立、冲突情况；省市机关被群众冲击、西北局和省委领导被批斗的情况；西北局、省委、军区领导对运动、生产的看法；农、工、商、交通等各业生产经营情况；西北局和省级机关成立造反组织情况等等。

4个月后，我和另外一位同志奉命到了乌鲁木齐，住新疆军区。这时自治区机关已被夺权，新疆军区已开始“三支两军”工作。支左军队和群众组织的矛盾、群众组织中各派的矛盾很尖锐。我们走访了军区领导郭鹏、张希钦、徐国贤、左齐、谭开云；自治区领导赛福鼎、齐果、武光、田仲等；接触了群众两派主要头头。报道了军队支左的主要举措和问题；各派的主要观点和主要举动；区机关被夺权后的情况；自治区领导被批斗的情况；最大量的报道是各派冲突武斗情况。

几个月后，我一人被派往银川，住独立师。与原在那里的两名记者一起，主要调查报道了军队支左、各派大联合的情况，北起石嘴山、南到同心，把工厂、矿山、农村看了一遍，调查报道了工农业生产情况。

外出西安调查采访中，我捅过一次漏子。根据记者站领导的要求，我专门调查了工厂运动情况，主要听取工人对运动的看法和要求。还特意找老工人、老劳模开了几个座谈会。这些人对运动意见很大，极力主张运动不要乱搞，更不能影响和破坏生产。我觉得工人的意见不无道理，符合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就做了如实反映。主要意思是工厂不同于学校，运动应有秩序地进行，不能影响生产。稿子发走没几天，就从北京通联组传来消息，说王力看了稿子很不满意，提出了批评。说这是反映了保守势力的主张。指责记者调查采访不该找老工人、老劳模等等。我着实吓了一跳，这不是一般人的一般批评。也就反复考虑下步工作如何减少失误，同时也做了写检讨受处分的思想准备。过了几天，我往北京打电话探听消息，才知道王力批评过后也就完了，对此没有深究。

#### ◇ 在北京遇到的几件事

1967年4月，我从外地回北京参加全站记者集训，并汇报情况。当时，记者反映情况的形式，除写成稿件传报以外，还有三种：一是记者回北京直接向中央领导汇报，回答问题。所问的情况，都是相当重要，文稿中不易说清的事情。我所在的组曾去汇报过两次。二是记者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中央解决各地问题的会议，随时为中央领导提供必要的参考材料。我所在的组，曾被抽去过一人。三是受中央领导的委派，对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作专题调查报告。如武汉1967年发生的扣押王力、谢富治的“七·二〇”事件后，周总理直接派记者站五个记者，当面交代任务，让他们组成调查组，去调查事件真相及相关反应，并尽快向他汇报。

我这次从外地回来，赶上了中央解决内蒙古问题的会议，是同秘书组的人一起参加的。会议由周总理主持，有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领导在场，下边坐着内蒙古党政军领导和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周总理在会上很严肃地批评了内蒙古军区的领导人打击群众的错误。也批评了军区支持的那派组织的头头，并宣布那派头头已不能代表那派群众，让那派组织另派代表来京参加会议，解决内蒙古的问题。当场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召来北京军区的两位领导，当场书写并

交给他们一纸命令，命令北京军区派部队去接管呼和浩特铁路局。让其中一位领导去内蒙古主持党政军工作。在这个会上，我亲眼目睹了周总理处理问题的果断和干练。会后回到记者站，听人介绍，中央对内蒙古问题的处理，与记者的调查报告有关。是驻呼和浩特的记者报道了内蒙古军区支持一派，压制一派，并向群众开枪的问题，记者也遭到内蒙古军区的关押殴打。中央和军委发现了这些问题，采取措施，改组了军区领导班子，派人去解救了记者。几天以后，周总理接见记者站回来集训的记者，讲话时又提起这件事，表扬说驻呼和浩特的记者站对了立场。我还赶上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同志的批斗会，这也是秘书组通知我去的。会上人山人海，我们到晚了，又没有报道任务，就在后边看了看。那天北京记者组拍了造反派体罚王光美同志的照片。他们写的稿件立即上了《快报》。周总理当天从《快报》中得知，造反派有开完批斗会用车载王光美同志游街的计划后，立即作了批示，马上传到清华大学，赶在批斗会结束前，制止了这一有辱国格人格的恶劣罪行活动。当时，记者站一些同志都明白，如不是记者当场快速发回报道，不是《快报》上报得及时，周总理处理得果断，沿北京市区的大游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很可能发生不测事件。记者当场拍的照片，我看过，它反映了造反派的恶行，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丑陋一幕。

当时我们的报道，特别强调真实、快捷，要达到中央领导要求的准、快二字。外驻记者对重要的事情，基本是当天发生，当天电话传到北京。编辑组立即编审处理，根据内容急缓程度，分别印成《快报》和《简报》，立即派机要通讯员直送中央领导办公地点。做到全国各地当天发生的紧急事件，当天晚上最迟第二天上午就能送到中央领导的案头。

#### ◇ 陈伯达的两次表演

1967年底，派驻各地的记者，大多数被召回北京参加集训，我也被叫回来参加。集训期间，陈伯达两次来记者站发表讲话，要求记者揭发批判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气势汹汹地批评了记者。

他首先质问曾去陈伯达家乡的福建惠安县做过调查报道的记者庄锡民同志：你到惠安去干什么？我陈伯达是不是大地主？他问得没头没脑，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好像记者去查了他的家庭出身似的。庄锡民原是新华社驻南京军区的记者，同我一起在一个组工作半年多，是个认真严谨、头脑冷静的同志。我真为他捏了一把汗，不知他怎么得罪了这个名声显赫的同乡。庄锡民也是福建惠安人，1967年他在福州记者组搞农村调查时，就近回原籍看看，也写了惠安农村的稿子。调查活动和所写稿件，根本没涉及陈伯达的家事。庄锡民一听急了，马上站起来说，自己去农村调查完全是正常工作，更没有调查任何人。陈伯达不听庄锡民的解释，继续大声质问，弄得会上气氛很紧张。下来，庄锡民同我谈过这件事，我们共同的疑问是：作为中央领导人的陈伯达，怎么能这样无根据地胡乱猜忌？不问青红皂白地随便训人？他家有什么事这么害怕？当然，这只是我们私下议论，并没往深处想。

陈伯达还批评了驻保定的记者。他一上来就问谁是驻保定的记者，得知此人已去外单位时，就让人去找。后来他见这位记者到场，也没问情况，开口就批。讲了一大篇，他的福建话太难懂，我只听出了大概意思，是指责记者报道中支左部队肯定的一方，是有错误的。记者的报道不对头。原来，这位记者在北京大学驻点报道中，反映过主张学生大联合，要团结不要分裂的意见，就引起过陈伯达的不满。后到保定报道中支左部队肯定过的一方，正是陈伯达打击的一方，这更触怒了这个华北的太上皇。记者站撤销后，陈伯达仍抓住这位记者不放，又批了几次。直到批陈的华北会议后，中央发现了陈伯达打击记者这件事，作为陈的一条罪状，写进了中央文件。

陈伯达讲话时，还对少数记者持红旗杂志记者证工作一事，提出了批评。他气呼呼地说：

谁让你们用《红旗》的记者证？我这个《红旗》杂志的总编辑怎么不知道？当场让人收回。记者们对他这一指责，很是震惊。记者开始只使用解放军报证件工作，后来因这样采访地方群众不大方便，才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少数人使用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证件。这件事连毛主席、周总理都知道。周总理在几个月前接见记者讲话时还提到过，说记者站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都是中央文革派出的，是一个口子的。周总理讲这番话时，陈伯达恰恰在场听了。他还一年中不断看《红旗》记者写的稿子，怎么能说自己不知道，反而指责别人呢？后来我在记者站听说，是毛泽东对《红旗》记者提出了疑问，他问过：凡是有《红旗》记者工作的地方，都很乱，这是怎么回事？这样，我才明白，陈伯达这是推卸责任，诿过于人。

#### ◇ 周总理评价过记者站的工作

周总理抓记者站较多，过问得很具体，很了解记者的工作情况。他1967年两次接见记者的讲话中，对记者的工作做过评价。

4月那次接见中，一开头就说：《快报》、《简报》报道了很多好消息。我们是依靠你们的《快报》、《简报》了解情况的，靠你们的消息是主要的。第二是省、军区的电报，两样合着看。我在广州接触了一些记者，共4位。今年解决各省的问题，到广州是第一回，我没带人去。我就靠这几位记者，帮助谈话，了解情况，很得力，帮助反映了不少情况，多数是正确的。

9月那次接见中，又是一上来就做总体评价。说：首先应该说，你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这是有益的工作，这一点中央一向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从你们这条线上得到了很多情况，给中央了解各省市的情况，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在这方面我们大家在一起经常谈到这方面的好处。所以，你们的工作成绩，首先应该加以肯定。比如说，有些地方即使你们报道得不多，但是只要发现了问题你们报道了，只要有提醒的价值，我们就很需要。因为去年党委的报告，许多地方不真实，今年当然不同。今年主要的报道负责机关是出于军区，军区对底下的情况也不是那么了解。革命群众组织这一派那一派，你们和他们接触多些，把他们的情况反映上来，补军区的不足。军区由上而下接触的报道，你们由下而上接触的报道，或者从某个侧面报道，这对我们都很需要。我们根据这些报道，了解和解决了许多省的问题。你们这个报道在这里起了作用，而且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对你们工作的成绩是有足够的估计的。

我参加了这两次接见，见到周总理那么忙，还了解得那么细，讲得那么具体，两次讲话用两个多小时，十分感动。现在翻看这两次讲话的记录打印稿，仍然激动不已。

#### ◇ 记者站工作结束

1969年党的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根据中央的决定，1969年5月，记者站工作结束，机构撤销。我们仔细登记了所存的文件、资料档案，全部移交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了移交手续。经集体评议、组织审批的程序，我们每人都得到记者站工作时个人思想和工作情况鉴定材料，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接见后，各返回原工作单位。

80年代整党，组织审查我在记者站工作经历的时候，我做了认真全面回忆，还查阅了当时的材料，做出了口头汇报。在翻找出的历史材料中，看到了我当年写的几句顺口溜。它虽带有“文革”印记，现在看来可笑，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现不妨把它抄录如下，帮助人们了解“文革”时记者的处境。

乘飞机、摆渡船、坐火车、背生烟，足踏双轮两脚颠，首都至边关。迎长矛、忍饥寒、访群众，不消闲，

调查研究目纵观，呈文过百篇。王力管、肖力兼、东兴教，总理谈，导师接见恩如山，永世铭心间。学理论、学路线、学立场、学观点，树立唯物世界观，收获有万千。

□ 《百年潮》2002.5

~~~~~

【更正启事】

本刊收到余汝信先生来函，言及本刊zk0506c所载刊登余先生《为丁盛辩》一文中提及丁盛任第四十五军代军长，“军部驻重庆，隶属于成都军区，为该军区辖区内（四川、西藏）唯一一个成建制的野战军。”正确提法应为“军部驻重庆，隶属于成都军区，为该军区辖区内四川、西藏唯一一个成建制的野战军。”特此更正。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